

第三章 《三國演義》中史傳體系的敘事結構

本章將從敘事文本內容的形式，亦即組成故事的結構，探究中國三大史體——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對《三國演義》的影響。

結構是敘事文學中非常重要的形式因素，是故事內容的總體配當和組織構造。張竹坡曾用形象化的文字將小說創作比喻為蓋房子，關鍵在於要將梁柱榫眼，接合得渾然一體，不落痕跡；而讀書的人，則要如拆房屋，使梁柱榫眼接合處，一一散開，盡在眼前¹。無獨有偶地，李漁也以相同的譬喻來形容戲曲的創作。²順著這樣的思路，我們可以說傳統的評點家，如金聖歎、毛宗崗父子、張竹坡等人無一不是拆屋高手，擅於將小說的結構重新拆解，條分縷析。

眾評點家中，毛宗崗是將「結構」二字正式帶入中國小說評點譜系的第一人。其評《三國演義》中，「結構」二字不僅出現頻繁，並佔有極重要的理論地位，如：「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設，以成全篇之結構者也。」³「文如常山率然，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豈非結構之至妙者哉！」⁴「(《三國》)不

¹ 原文為：「故做文如蓋造房屋，要使梁柱筍眼都合得無一縫可見。而讀人的文字，卻要如拆房屋，使某梁某柱的筍皆一一散開在我眼中也。」張竹坡著，〈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詳參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3月第一版），頁103。

² 原文為：「至於結構二字，……工師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間架未立，先籌何處建廳，何方開戶，棟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揮斤運斧。倘造成一架而後再籌一架，則便於前者不便於後，勢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毀，猶之築舍道旁，兼數宅之匠資，不足一廳一堂之用矣。」引自李漁著，《閒情偶寄》〈詞曲部·結構第一〉，（臺北：長安出版社，1979年9月臺三版），頁6, 7。

³ 陳曦鍾等人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二次印刷），頁18。

⁴ 同上書，頁1145。

似《西遊》、《水滸》等書，原非正史，可以任意結構也。」⁵「敘事作文，如此結構，可謂匠心。」⁶其對「結構」二字的使用，是指對內容情節的組織構造而言。毛宗崗如此重視結構，正可以看出他對敘事文學形式因素的關注，以及對史書與小說之間結構異同的敏銳觀察。

敘事文學的結構可就內外兩方面來考察，以歷史章回小說為例；其外在的結構框架是採用一種分卷、分則或分回敘述的體例，這樣的體例固然和因為文人參照史書來編撰歷史演義，自覺地採用了分卷分節立目的講述方式有關，但更直接影響可能要來自於宋元平話的格套，因為講史平話講論歷史百代興廢爭戰之事，頭緒繁雜，不易「頃刻間提破」，所以為方便藝人講述和讀者接受，就採用了分卷分節立目的講述格式。這樣外在的結構框架雖然清楚可見，但歷來的評點家也大多習以為常，未多加論述。他們毫無例外將所有關注焦點擺在章回小說的內在結構，而這一部分也是本章論述的重心所在。

敘事文學的內在結構即是故事情節(plot)⁷的組織。以史傳為例，史家著史之前，他所要面對的是無數的歷史片段，這些片段不僅紛繁雜亂，彼此之間亦缺乏內在連繫，而史家的工作便是對這些片段刪汰、擷取、修飾，並施予情節(emplotment)，使片段間不僅有了時序關係，也賦予它更明確的因果連繫，成為一個完整的文本，在創作與閱讀之間達到初步的成果。中國的史學發達，史冊浩如雲海，在歷代史家的努力下，史冊逐步發展出一種講述

⁵ 同上書，頁 1145。

⁶ 同上書，頁 1370。

⁷ 王靖宇對情節所下的定義：「發生在故事中的各個事件，為了形成連貫性，必須用特殊的方式連接起來，安排妥當。這種特殊的方式將各種事件包容到一個故事裡，我們稱之為情節。」語見《中國早期敘事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3月第1次印刷），頁9。

歷史的固定模式，史家對這種敘事模式或許並不自覺，但敘事模式仍然支配了中國千年來的史傳論述傳統。海頓·懷特(Hayden White)曾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

我們對歷史結構和程式的理解更多地由我們在表述時省略的東西來決定，而不是由我們放進歷史結構和程式中的東西來決定。正是這種爲了構成綜合故事而保留某些事實，同時排除其他事實的能力使得歷史學家表現出他的策略性和理解力。⁸

以《三國志》爲例，作者陳壽關注的焦點往往只在歷史人物的功名仕宦，曾任某官職，接著又升任爲某某，或降職爲某某，亡故後兒子承襲何種爵位，接任何種官職等等，至於妻女和其他親屬則常排除在外。另外傳主的私人生活和好尚通常未提到，對人物的情感世界和思想活動也鮮少觸及，寫到人物的情緒反應時，總是直接而強烈，「公怒曰……」、「操大喜……」、「先主大怒」。這樣的特色不僅出現在《三國志》，其他史書也有類似的傾向，從這裡就可以看出敘事文學的結構模式往往受制於民族文化的深層觀念，反映出民族的集體潛意識。

《三國演義》作爲中國第一部長篇歷史演義小說，其以歷史爲主要的題材來源，在情節結構方面直接借鑒於史書仍是順理成章的事。因此，「以體例言之，有演一代史事而近於斷代爲史者；有以一人一家事爲主而近於外傳、別傳及家人傳者；有以一事爲主而近於紀事本末者；亦有通演古今事與通史同者。」⁹接著本章

⁸ [美]海頓·懷特著，〈作爲文學虛構的歷史本文〉，收於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5月第二次印刷），頁170。

⁹ 孫楷第著，《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5。

將從中國的三大史體——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的結構體例著手，探討以記敘歷史人物為主體的紀傳體結構模式、以年系事為原則的編年體結構模式、以事為主軸的紀事本末體結構模式三者對《三國演義》敘事模式的影響。

第一節、記敘歷史人物為主體的紀傳體結構模式

先秦時期充滿歷史意識的著作，如：《尚書》、《春秋》、《左傳》、《國語》等史著即一再積累，但中國史學能獨立成家，自成一格，卻是從漢時司馬遷著《史記》開始。司馬遷著《史記》有極高的自我要求，那就是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¹⁰《史記》總結先秦以來的史學成就，繼承漢初的歷史思想傾向，標誌著中國古代史學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歷來文人多稱揚《史記》濃厚的文學藝術性，強調其在文學史上的影響力，但從史學的角度來看，《史記》自創的紀傳體敘事模式成為中國歷代史書的典範，恐怕更值得敘事學家的注意。它所創立的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¹¹，像個分類精細的檔案櫃，收編了黃帝到漢武帝年間約三千多年的歷史，容納了紛繁雜亂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在結構上成就了一個完整、有層次的歷史敘事時空，這一結構的創立讓紛繁的事件和人物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歷史定位。司馬遷為成一家之言，對確立《史記》結構體系比《左

¹⁰ 語出〈報任少卿書〉。〔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四十一，點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一版一刷，冊五），頁1865。

¹¹ 「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語出劉知幾著，《史通》〈二體〉。劉知幾著，《史通》〈二體〉，（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9月20日），頁28。

傳》作者更有自覺性，其功能性也就遠勝前書。《史記》結構模式雖然受到前代文獻的啓發，但從總體上來看，它是面對浩瀚無邊的史料所進行的一項開創性工作。連梁啓超都對這種創造結構的天才與魄力大表讚賞：

遷書取材於《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等，以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織而成。其本紀以事繫年，取則於《春秋》；其八書詳紀政制，蛻形於《尚書》；其十表稽牒作譜，印範於《世本》；其世家列傳，既完雅記，亦采瑣語，則《國語》之遺規也。諸體雖非皆遷所自創，而遷實集其大成，兼綜體而調和之，使互補而各盡用，此足徵遷組織力之強，而文章技術之妙。¹²

和編年體史書《左傳》兩相比較，其最大的優點就是記人敘事較為集中，能夠形成相對完整、獨立的敘事整體，而不像《左傳》在記人敘事方面，有時不得不依靠倒敘、插敘的方法使人物和故事相對集中。從全書的整體脈絡來看，「其縱向是表現不同歷史階段天下大勢的基本態勢，主要體現在表和本紀的形式裡，其橫向是展示眾多歷史事件的發展演變和歷史人物的興衰際遇，主要體現在以歷史人物為中心的世家、列傳和少數幾篇本紀的形式中。這樣就構成了其敘事方式的最大特點：以歷史人物為活動和運作為半徑，有選擇地把相關的人物和事件組織在同一圓環之中，從而形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的紀傳。」¹³這樣成功的敘事結構成為中國正史的固定體例，也就不是件令人意外的事了。

¹² 梁啓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10月），頁59。

¹³ 鄭鐵生著，《三國演義敘事藝術》，（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頁93。

陳壽在創作《三國志》上受到司馬遷極大的影響，這不僅表現在實錄精神、史學思想、藝術表現手法上，《三國志》更繼承了《史記》紀傳體體例，將魏、蜀、吳三國並列，「創融國別、與紀傳、斷代為一體的新例。」¹⁴但或許因為身處國家分裂的亂世中，陳壽所能掌握到的資料有限而分散，《三國志》在規模上明顯比《史記》小很多，不僅沒有書、表，而且對人物事蹟的記載不再分本紀、世家、列傳，而是簡單地分為紀與傳兩類，陳壽以魏為正統，因此三國中唯魏國君主為紀，如：〈武帝紀〉、〈文帝紀〉等，其他皆為傳，如記劉備的〈先主傳〉、孫權的〈吳主傳〉。然而紀與傳之間的區分意義出於政治現實，兩者的敘事風格並無二致。因此《三國志》可謂純粹的紀傳體史書。

從敘事風格來看，《三國志》可以簡單地區分出兩種敘事模型。第一種可稱為紀年型傳記。以事繫年，簡明扼要，沒有細節描寫，只有類似於報紙上的標題報導，這種敘事模式主要出於三國君主的傳記。在古時，君主是國家的化身，因此有關一國逐年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便全數記在他的名下。詳閱《三國志》可以發現除了開國君主曹操、劉備、孫權能寫出洋洋灑灑的英雄事蹟外，其繼任者或因個人的無所作爲，或因在穩定的國家制度運作下，而喪失了其個人特色，君主傳記也就大多淪為一個國家政治發展的扼要記錄，在這一方面，〈蜀書·後主傳〉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蜀漢在劉備去世後，實際的掌權者是諸葛亮，劉禪只是蜀國的象徵性人物，因此他的傳記便即為簡單扼要，如：

（建興）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

¹⁴ 關四平著，《三國演義源流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次印刷），頁9

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爲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15

這裡的敘事是以統一、明確的時間順序來串接事件，只寫事件發生的結果，敘事簡明扼要。想要進一步探究這些事件發生的起因與過程，就必須到相關人物傳記中尋找；而後主的作爲和個人特色則完全排敘述之外，。

第二類則是名人傳記。這類傳記中時序依舊是串連接件的主軸，但對全文的支配力顯然要比紀年型微弱許多。敘事速度緩速不定，更富動感，文中除了對傳主的事蹟和個性詳細抒寫外，更加入了爲數眾多的直接引語。這些直接引語包括傳主的言論、對話，以及大多首尾俱全的章奏表議等官方文件。被敘述出來的人物事蹟和傳主的個行事風格及生命情態密切結合。以〈董卓傳〉爲例，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少好俠，嘗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¹⁵

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又封卓母爲池陽

¹⁵ 〔晉〕陳壽著、李宗侗主編，《新校三國志注》下，〈後主傳〉。臺北：世界書局，1972年9月初版。頁894, 895

¹⁶ 〔晉〕陳壽著、李宗侗主編，《新校三國志注》上，〈董二袁劉傳〉。臺北：世界書局，1972年9月初版。頁171

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¹⁷

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偃轉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¹⁸

文中寫董卓得人心而在亂世中暴興，也因其跋扈張狂、虐殺人民而暴亡。這類的敘事更具情節發展性，自然成爲《三國志平話》及《三國演義》創作上汲取、仿效的對象。¹⁹

整體而論，《三國志》依不同的身份、專長以及時空背景，將三國時代的人物分門別類，再以人物生平發展爲敘事軸心，詳述傳主的一生事蹟，將他們放置時代和社會的空間裡，恣意揮灑筆墨，從而構成多面向、多層次、多色彩的人物體系。在這裡有帝王、有權臣、有謀士、有武將，個個千姿百態，爲《三國演義》在記人寫事上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和建構模式，而以人物爲書寫中心的模式也避免了在編年體和記事本本體史書中見事不見人的毛病，讓《三國演義》能達到人中有事、事中見人的美學效果。下面就從兩方面來看紀傳體史書《三國志》對《三國演義》的影響：

一. 提供敘述人物的基本模式

前文強調各種敘事文類都有其固定而慣用的敘事模式，在這一方面，中國歷史敘事淵源流長，其定型化傾向更是明顯。因此我們很容易在史冊中找到反覆出現的敘事模式，浦安迪稱此爲敘事單元，在他的著作《中國敘事學》中，有精闢的論述：

¹⁷ 同上書。頁 174

¹⁸ 同上書，頁 176。

¹⁹ 這兩種敘事模式參考〔俄〕李福清著，《三國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頁 20, 21。

如果我們把《史記》各個列傳中的許多片段節取下來，就會發現，它們與虛構文學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列傳往往以「某某者某郡人也」開端，然後繼之以傳主的經歷，再在「危機」、「大功」、「大敗」等一系列既定的美學外形中過濾，組成一種定型的模式。這種定型的敘事單位不僅是歷史書，而且也是全部中國敘事文學的慣用單位。²⁰

而這樣將傳主的性格、身世、經歷在其首次出場時便介紹得清清楚楚的敘事模式，也深深地影響到《三國演義》中對人物的塑造。《三國演義》中每當有人物第一次出場時，總是先確定該人的姓氏，再介紹其出身、家世，發跡前的特殊作為，鄉黨的評價等；接著選擇某些經歷，說明其主導思想與性格。如曹操出場時，便道：

為首閃出一將，身長七尺，細眼長髯，官拜騎都尉，沛國譙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為中常侍曹騰之養子，故冒姓曹。……操幼時，好遊獵，喜歌舞，有權謀……²¹

接著列舉三事描寫曹操為人，一、幼時曾假裝中風，欺誑其父；二、許劭稱他：「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大喜；三、年二十，舉孝廉，為郎，不避豪貴，威名頗震。在幾近一頁的篇幅中，作者以評論式干預的手法，跳脫原本的情節敘述，將一個人物裡裡外外介紹清楚，然後推向臺前。而這種人物介紹務求完整、系統化的現象在《三國演義》發展到極致，那怕是一些次要人物，如第四十八回〈宴長江曹操賦詩〉中甫一出場，就因為掃

²⁰ 浦安迪著，《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月第二次印刷），頁60。

²¹ 陳曦鍾等人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二次印刷），頁9。

曹操酒興，而遭曹操手起一槊、刺死的劉馥，羅貫中都不忘對他的身世做個完整的交待，「操視之，乃揚州刺史，沛國相人，姓劉，名馥，字元穎。馥起自合淝，創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學校，廣屯田，興治教，久事曹操，多立功蹟。」²²如此敘事固然有貶斥曹操濫殺忠良外，但無疑地，這種根深柢固的敘事模式是來自於紀傳體史書的影響。

以現今的觀點來看，這種人物塑造模式過於死板，容易導致典型人物的絕對化，如毛宗崗所提到的「三奇」、「三絕」，諸葛亮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是賢相的典型；關羽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是名將的典型；曹操是「古今來奸雄中第一奇人」，是奸雄的典型。這樣的典型是世人對他們的歷史公評，於人物出場時便已塵埃落定，再無發展性。

如此典型化人物塑造其實和紀傳體例習習相關，紀傳體史書以人物為主體，在整個敘事框架中，人物則以其時代先後、地位、才幹及歷史評價做為分類標準，數人記於一卷，因此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不是單一的個體，而是和社會環境緊密連繫的人物群像，以《三國志》中的《蜀志》為例，除記君主與諸葛亮為單傳，其餘皆為合傳，卷三十六記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為蜀國開國大將，卷三十七記龐統、法正，為劉備最重要的謀臣，卷三十八、三十九則記許靖、麴竺等大臣，卷四十記劉封、彭羨、魏延、楊儀等一千文官武將，本卷所記人物都因個人性格缺憾、行事可議，而不得善終。

身為史官，陳壽在記敘這些歷史人物時，一般而言，往往只突顯其某一方面的道德品質以及才能，並以一致的標準做為評價

²² 同上書，頁 603。

根據，如君王要寬大為懷、知人善任；武將必須勇猛善戰、寧死不屈；謀士則要智謀過人，知無不言，如此一來，《三國志》中的歷史人物自然缺少了多面向的性格特徵。因此讀者可以在《三國演義》中看到眾多善於運籌帷幄、料事如神的謀士，善於行軍用兵、能衝鋒陷陣的武將，武將的現身總是伴隨著相似的套語，「只聽得山背後喊聲大起，閃出一彪人馬，為首大將飛馬挺槍，直取……」接著是一陣廝殺；謀士則是「言未畢，帳下忽轉出一人曰……」接著是一段高度理性化的真知灼見。

從文學的角度，可以看出《三國演義》中塑造出來的人物形象和佛斯特(E. M. Forster, 1879~1970)所謂的「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相近，是「依循著一個單純的理念或性質而被創造出來」²³，劉備是寬仁的典範，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關羽則是忠勇的象徵，他們全都代表著儒家道德觀的具體實踐。這種典型化的人物塑造雖然單一、缺少變化，但也未必全無好處，特別是在歷史小說，人物多如沙數，旋起旋滅，典型化人物行事直捷明確，鮮少疑懼不定，其性格不因外在環境而變，這樣的人物性格鮮明，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不僅易於辨認，也易為讀者所記憶。

二. 人物性格與歷史事件的結合

不可否認地，所謂的「歷史」其實正是「人」的歷史，記載著人類政治、經濟、學術、習俗等各方面的發展。歷史雖然有其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但它所反映的不僅僅是事與事之間的因果關係，同時也是人類合目的性的社會參與。因此如果只強調人類合目的性的社會實踐，而不講求歷史的規律性，歷史人物的活動

²³ [英] 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0年6月新版三刷)，頁92。

便失去客觀性；反之，只重視歷史的規律性，歷史人物的活動就失去其主體性。²⁴同樣地，所謂的「歷史小說」正是以尊重歷史事實為核心，利用藝術技巧融合史實與想像，對歷史人物與事件進行敷演的一種文類，如果作者片面地張揚人的能力，進而扭曲了歷史的客觀發展，此小說自然稱不上是歷史小說；但如果作者只著重於歷史規律的闡述，無視於人的生命投入，這也只是歷史事實的記錄。

以《資治通鑑》和《三國志平話》的對比為例，在整體組織架構上，《資治通鑑》是編年體史書，它的編纂精神在揭示歷史事實與規律，讀者在閱讀這樣的史書時，看到的是永遠不停向前發展的歷史，而人只是短暫的過客。這樣的敘事模式儘管保存了事物原貌，卻也令人的主體性不彰，成為歷史長河中簡化的符號；相對於《資治通鑑》，《三國志平話》位處於天秤的另一端，它將錯綜複雜的歷史予以簡化，以近乎迷信的因果報應模式解釋三國的分分合合，過度膨脹人的能力（如諸葛亮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與法師無異），扭曲了歷史發展的事實與規律。

相對於前二者，《三國演義》對於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連繫更加成熟、精練，而這正得力於紀傳體史書的結構模式。從表面來看，《三國演義》是記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間的「事」，然而正如紀德君所言：

《三國演義》則在編年體的結構中巧妙地糅合劉、關、張及諸葛亮等人的英雄經歷及事功偉勳，讓他們依次成為焦點人物，而又沒有從錯綜複雜的政治軍事鬥爭中游離出

²⁴ 鄧鴻光、李曉明主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第一輯，（武漢：崇文書局，2002年10月第1版），頁5。

來，所以就兼具了編年、列傳二體之長而獲得了成功。²⁵

羅貫中技巧性地利用各個時期最具影響力的人物為中心，串接整段歷史的發展，讓《三國演義》成為眾英雄人物傳記的集合。

開頭是董卓傳，在第九回結束其張狂的一生；接著是呂布傳，到第十九回白門樓隕命而告終；再來是曹操傳，寫其許田打圍、煮酒論英雄、土山約降關羽，到第三十三回定遼東、統一北方而打住；然後是劉備傳，有荊州依劉表、躍馬過檀溪、新野遇單福等片段，直到第三十六回才把主角的位置讓予諸葛亮，由諸葛亮獨領風騷，舌戰東吳群儒、三氣周瑜、白帝托孤、七擒孟獲、六出祈山，而在第一百四回結束其悲劇性的一生，至此三國英雄凋零，進入尾聲，最後由姜維九伐中原、晉滅蜀滅吳收尾。所謂的「江山代有才人出」，《三國演義》靠著聚焦於關鍵人物，成功地串連起整段三國歷史。

和後文將論及的《通鑑紀事本末》相較，更容易看出《三國演義》作一部歷史小說，其對歷史人物與事件之間相互連繫的獨到之處。從兩者之間的卷目回目就可以看出端倪，《通鑑紀事本末》記漢末到晉初一段歷史，是從卷八上〈宦官亡漢〉、卷八下〈黃巾之亂〉、〈韓馥之叛〉、〈袁紹討公孫瓚〉、卷九上〈曹操篡漢〉、卷九下〈孫氏據江東〉、〈劉備據蜀〉，直到卷十一下〈晉滅吳〉為止，從卷目明顯反映出來的是，《通鑑紀事本末》的重點放在歷史事件，而不在人物身上，寫的是「事」，而且是靜態、既成事實的「事」，事有起訖，而人物也隨史事開始和終止，顯得既片段又零碎；相反地，《三國演義》的回目，如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第二回〈張翼德怒鞭督郵 何國舅謀誅宦豎〉、

²⁵ 紀德君著，《明清歷史演義小說藝術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次印刷），頁167。

第三回〈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饋金珠李肅說呂布〉，則更加突顯人的主體性，由歷史人物所引導出來的歷史事件，展現出富於動態的敘事風格。

而這種對人物主體性的重視其實正根源於正史——紀傳體史書的傳統。質言之，所謂的紀傳體史書就是記歷史人物的傳記，寫其一生經歷、重大事蹟、主導思想與性格，並給予恰如其分的歷史評價。以人物為中心來寫事，如此一來，事不再是零散、毫無內在連繫的事，而是與人物生命特質習習相關的事。以關羽大意失荊州一段情節為例，失荊州是三國時期重大的歷史事件，它重組魏蜀吳三國的勢力版圖與聯盟關係，對於蜀吳二國發展影響甚鉅，《三國志》不僅對這段歷史經過詳加敘述，同時聚焦於身為蜀軍統帥的關羽所犯下數件政治軍事上的致命錯誤，而種種錯誤則歸結於關羽個人性格上的缺陷。

「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²⁶，他破壞蜀吳聯盟在先，北伐曹魏後，又不知要嚴防東吳偷襲，在看完陸遜一封卑言諛詞的書信，更毫無顧忌地「撤荊州大半兵赴樊城聽調」，為東吳長驅大進、徑取荊州提供了絕佳的時機。陸遜言：「羽矜其驕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²⁷可謂知己知彼。陳壽盛讚關羽：「萬人之敵，為世虎臣。」「報效曹公，有國士之風。」但也點出他的性格缺陷：「剛而自矜。」，並直言：「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²⁸羅貫中對關羽備極推崇，為了塑造這個「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不僅對他多所美言，更不惜扭

²⁶ [晉]陳壽著、李宗侗主編，《新校三國志注》下，〈關張馬黃趙傳〉，（台北：世界書局，1972年9月初版），頁941。

²⁷ [晉]陳壽著、李宗侗主編，《新校三國志注》下，〈陸遜傳〉，（台北：世界書局，1972年9月初版），頁1344。

²⁸ [晉]陳壽著、李宗侗主編，《新校三國志注》下，〈關張馬黃趙傳〉，（台北：世界書局，1972年9月初版），頁951。

曲歷史事實，將幾場勝仗歸功於他的忠義與神武，如虎牢關斬華雄，官渡之役斬顏良、文醜，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等。但儘管崇揚關羽的忠勇精神，卻也對他「剛而自矜」的性格多所著墨，如〈關羽傳〉：「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²⁹《三國演義》中更誇張為關羽欲入蜀與馬超比試武藝，經諸葛亮勸阻而做罷；另外〈費詩傳〉提及「先主為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³⁰《三國演義》也如實描述了這段典故。此外，更虛構了其怒斥吳國使者諸葛瑾等情節，成功地豎立起關羽忠肝義膽卻又驕傲自信的形象，讓他的性格內在而又直接地與失荊州的歷史情節相連繫。

如此強調歷史人物的主體性，成功地縮合人物性格和歷史事件，不能不說是紀傳體史書對歷史小說、特別是《三國演義》最大的貢獻。

第二節、以年繫事為原則的編年體結構模式

《三國志》雖然是整個三國歷史的起源文本，同時也為《三國演義》提供了寫人敘事基本的結構單元，但它的侷限之處亦顯而易見。一來，陳壽將魏、蜀、吳三國並列而敘，形成三股各自獨立的敘事軸線；二來，《三國志》內容稍嫌貧乏，需要裴注的補充，但裴注游離於正史文本之外，欠缺體系；三來，《三國志》屬紀傳體體例，敘事依人分傳，因此同敘一事，通常是數傳分載。

²⁹ 同上書，頁 940。

³⁰ 〔晉〕陳壽著、李宗侗主編，《新校三國志注》下，〈霍王向張楊費傳〉，（台北：世界書局，1972年9月初版），頁 1016。

正如劉知幾所說：「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³¹其結構模式以年經人緯爲原則，對於建構以人爲中心的基本單元是成功的，但當它要組合成更龐大的敘事結構，就不免抓襟見肘，不利於表現歷史事件發展的全過程。因此羅貫中要建構長篇歷史小說，就必須捨棄紀傳體結構模式，乞靈於另一種敘事模式——編年體。

提供依時序事的基本結構

就整體敘事結構而言，《三國志》並未給予讀者一個一目瞭然的全景圖，想要從中探索出歷史發展的軌跡，我們必須以魏國的紀年爲準，在各個不同的人物傳記當中，相互索引、連接，重新建立事件的本末和因果關係。易言之，如果缺乏這項重組的工作，我們無法對當時的事件等有個整體性的認識。而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鑑》，他的首要工作就在於重組歷史。劉知幾曾論編年體的長處在於：

繫日月而爲，列歲時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³²

《資治通鑑》起自戰國時期韓、趙、魏三家分晉（西元前 403 年），下至五代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 959 年），1362 年的史事皆按時間先後編次，直接以朝代紀元表示情節的延續和推移，形成一種以時序爲中心的「秩序美」，而這種依時序事的結構，提供了中

³¹ 劉知幾著，《史通》〈二體〉，（台北：華世出版社，1981 年 9 月新版一刷），頁 36。

³² 劉知幾著，《史通》〈二體〉，（台北：華世出版社，1981 年 9 月新版一刷），頁 35。

國歷史小說構築長篇巨著一個重要的借鏡。

編年體和紀傳體在敘事結構的差異何在？以下就以「赤壁之戰」這件決定三足鼎立的歷史事件為例，重現司馬光在編著《資治通鑑》時，如何對起源文本《三國志》進行連接、重組。兩者的對照如下：

| | 《資治通鑑》 | 《三國志》 |
|----|---|--------------|
| 1. |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 | 引自〈魯肅傳〉 |
| 2. | 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阪。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 | 引自〈先主傳〉裴松之注 |
| 3. |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詢孫權。…… | 引自〈諸葛亮傳〉 |
| 4. | 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 | 引自〈吳主權傳〉裴松之注 |
| 5. | 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之辭。……愚謂大計不如迎之。 | 引自〈周瑜傳〉 |
| 6. | 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 | 引自〈魯肅傳〉 |

| | | |
|----|---|-------------------------------|
| 7. |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 | 引自〈周瑜傳〉 |
| 8. | 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並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 | 引自〈周瑜傳〉裴松之注 |
| 9. | 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眾，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曹）引軍北還。 | 引自〈周瑜傳〉、〈周瑜傳〉裴松之注、〈武帝紀〉、〈先主傳〉 |

赤壁之戰發生於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十月（西元 208），《資治通鑑》對這場戰役的敘述大抵可分作以上九段。首先聚焦於吳國，由「先」字引導的一段預敘，交待在稍早時，魯肅預料曹操不久將南侵荊州，希望出使劉備，遊說劉備共同抵抗曹操；第二段的焦點移到劉備方，曹操趁荊州刺史劉表新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進佔荊州，劉備打算南遁至蒼梧，依附吳巨，經過魯肅一番解說後，與孫權結盟；第三段則是諸葛亮和魯肅一起求見孫權，表達劉備誓不投降，藉以激勵孫權一起對抗曹操，本段羅貫中敷演為諸葛亮舌戰群儒的精彩橋段；第四段，曹操以書信告知孫權南侵之意，希望吳國能不戰而降，而吳國群臣震驚失色；接著第五段，文臣以張昭為代表，表達實力懸殊，請降為上的態度；第六段，魯肅以利害關係勸孫權勿降；第七段，周瑜更深入剖析雙方

優劣勢，勸孫權一戰；第八段，孫權下定決心與曹操決裂，以周瑜、程普為將，迎戰曹兵；第九段以簡要的概括敘事交待戰事，曹軍因疾病失利，接著周瑜以火攻打敗曹操，迫其引兵由華容道北還。

從這個例子來看，編年體《資治通鑑》改寫紀傳體《三國志》，司馬光侷限於史家身份，對於歷史無容虛構，所有的訊息均來自於《三國志》和裴注，因此《資治通鑑》在改寫過程中，不僅缺少資料的外加性，而且除少數字詞白話化外，絕大部分都是原文抄錄。但從整體結構而言，同一件歷史事件，編年體能從容地將焦點流轉於三國各個人物之間，構築起完整、首尾相貫的歷史故事；而在紀傳體中，卻分載於〈魯肅傳〉、〈先主傳〉、〈諸葛亮傳〉、〈吳主權傳〉、〈周瑜傳〉、〈武帝紀〉及裴松之注等各處。這正顯示，對於相同的歷史素材，用不一樣的敘事結構去組織材料，就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敘事效果。特別是赤壁之戰這樣複雜的歷史事件，魏蜀吳三國均牽涉其中，相關的人物極多，紀傳體《三國志》在敘述事件時便顯得左支右絀，不僅片段零碎、分見諸卷，各卷之間的記載也常出現不連貫、互有出入的現象。如對於促成劉備、孫權聯盟之功，究竟屬於諸葛亮還是魯肅？歷來爭議不斷，裴松之：「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³³這樣的缺陷不全都作者陳壽個人的疏失，紀傳體體制的侷限才是原因所在，而《資治通鑑》的改寫恰足以彌補這些缺點。

依史冊記載，赤壁之戰前後不過三、四個月，但羅貫中卻以極大的篇幅敷演之，從第四十三回〈諸葛亮舌戰群儒 魯子敬力

³³ 〔晉〕陳壽著、李宗侗主編，《新校三國志注》下，〈周瑜魯肅呂蒙傳〉裴松之注，（台北：世界書局，1972年9月初版），頁1269。

排眾議〉到第五十回〈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羅貫中雖然虛構了如諸葛亮舌戰群儒、智激周瑜、群英會蔣幹中計、孔明借箭、黃蓋苦肉計、闕澤獻詐降書、龐統連環計、諸葛亮作法求東南風、關羽華容道放曹操等故事，然而整體的情節發展與《資治通鑑》的記載相符。因此在三國題材由正史到小說漫長演化史中，如果將《三國演義》龐大而完整的敘事結構，歸功於羅貫中個人天才的創作，而完全忽略了編年體《資治通鑑》承先啓後的關鍵作用，將無法正確理解中國長篇歷史小說發展。

第三節、以事爲主軸的紀事本末體結構模式

在明代章回小說的發展史，如果能看到歷史著作在小說發展過程中所占的關鍵地位，那麼中國第一部章回小說是一部歷史小說絕對不令人意外。從宋元的講史興盛的情況可以看到古人對歷史的熱忱，吳自牧《夢梁錄》卷二十《小說講經史》說道：「講史書著，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很明顯地，《資治通鑑》很早就受到說書人的重視和利用，但正如勞悅強所言，這裡所指的《通鑑》很可能是泛指，其中還應包括朱熹的《通鑑綱目》和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等，而並非專指《資治通鑑》一書而已。³⁴

《通鑑紀事本末》全書共分四十二卷，體制宏大，所記載的史事完全根據《資治通鑑》。袁樞的著書緣由，依據〈宋史·袁樞傳〉所記：「樞常善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

³⁴ 勞悅強著，〈從紀事本末體論章回小說的敘事結構〉，收於辜美高編，《明代小說面面觀：明代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頁47。

事而貫通之。」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改編方法就在於「區別其事而貫通之，」亦即將《資治通鑑》裡的歷史材料，以事為單位，歸納成相應的主題，將上下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條分屢析、重新組合，編排成二百三十九個首尾相貫、因果相連的事件。改寫經典的工作，注定《通鑑紀事本末》必然缺少了資料的外加性及事件的擴大性，但其所開發出來的紀事本末體卻代表了全新的史學敘事體裁的誕生。

一. 以情節因果關係為軸線的敘事模式

袁樞自稱著書的起因是：「常善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以「浩博」二字形容《資治通鑑》雖然不差，但失之於簡。當袁樞完成著作，為其作序的楊萬里顯然更明確地指出問題所在，其序云：

予每讀《通鑿》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釋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

35

另外，《四庫全書總目》也將紀事本末體跟編年體和紀傳體比較：

紀傳之法，或一事而復見數篇，賓主莫辨；編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數年，首尾難稽。樞乃自出新意，因司馬光《資治通鑿》，區別門目，以類相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包括數千事蹟，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了然，遂使紀傳、編年貫通為一，實前古之所未見也。

³⁵ 〈通鑑紀事本末〉敘，見袁樞著，《通鑑紀事本末》，台北：里仁書局，1980年11月21日。

楊萬里和《四庫全書總目》的作者對袁樞此書皆有讚許之意，同時也指出了《資治通鑑》在體例上的缺陷。

以體例而言，《資治通鑑》是編年體史書，它的優點在於依時序事，能將所有史事網羅其中，呈現為歷史發展的全景圖，但另一方面，它也和《左傳》一樣，有著依時序事的限制，那也就是《資治通鑑》必須按照史事發生的前後次序來敘述，如果一件史事的發展過程跨越數年，而其中又不是年年都有相關的事情可記，將不可避免地形成敘事上的斷裂。正如傅修延所言：

編年體的本質特徵是「依時序事」，然而歷史事件既不會均勻平衡地散佈於各個時間區域，也不會井然有序地次第發生，它們可能在一段時期內相對沈寂令史家無事可述，也可能差不多於同一時刻交集紛來使人們目不暇接，因此按照時間不可逆的線性方向進行按部就班的分年記事，並非達敘事目標的最理想體制。³⁶

編年體以年繫時、以時繫月、以月繫事，因此如果某一個時刻有數件歷史大事發生，礙於編年體依時序事的成規，史家就必須以月份為單位，將不同地域、不同人物所發生的事，切分為數段，讓同一段時間內發生的事同時並呈於讀者的眼前，如此一來，犧牲的自然就是事件原有的因果連繫。以《資治通鑑》卷六十三，獻帝建安五年所記孫策遇襲而亡一事為例，這一年中最重要的是北方曹操、袁紹的官渡之戰，因此司馬光用絕大多數的篇幅，來寫這場決定何人統一北方的歷史大事，從五年春兩軍於官渡對峙、至冬十月曹操烏巢劫糧、大敗袁紹。然而這段時間，割據江東的孫氏政權也發生了一件至關重要的事，孫策遭許貢刺客偷襲

³⁶ 傅修延著，《先秦敘事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頁221。

而隕命，然後傳位予孫權，這件事孤立來看，似無重要，但如果放到孫氏政權在江東的發展中，則是項重大的轉折點，一來少年英雄孫策打算於曹操、袁紹僵持於官渡之時，出兵徑襲許都的計畫落空，讓曹操幸運地逃過腹背受敵的噩運；二來冬十月時曹操聽聞孫策已死，想趁此機會伐江東，因侍御史張紘進諫而止。然而依《資治通鑑》的敘述，此事孤立地穿插在官渡之戰當中，其所代表的歷史意義便無法突顯出來。

如浦安迪所言：

編年體的煌煌巨著如《資治通鑑》，與其說是爲了按時間順序講述歷史事件，還不如說是爲了把重要的歷史文獻包羅無遺。中國的俗話說，「歷史是一本陳年流水帳」。³⁷

這種歷史等同於帳簿的觀念並非前無所因，褚人獲即指歷史爲大帳簿，歷史小說則爲小帳簿，前者總記，後著雜記。³⁸而在這一陳年流水帳中，時間是組織內容唯一的軸線。事件之間缺少應有的因果連繫。袁樞爲《資治通鑑》的「浩博」而苦，楊萬里指其「如山之峨，如海之茫」，所反映出來的不是他們個人的問題，而是所有文人在閱讀編年體史時所遇到的困擾，其根源就來自於編年體結構的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在袁樞開創出來的紀事本末體中得到初步的解決。

就敘事學的觀點而論，任何敘事要能成立，情節中的事件就必須有一個前後相續的「可追蹤性」³⁹，這個可追蹤性可以是時

³⁷ 浦安迪著，《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月第二次印刷），頁47。

³⁸ 褚人獲〈隋唐演義序〉：「昔人《通鑑》爲古今大賬簿，斯固然矣。第既有總記大賬簿，又當有雜記之小賬簿，此歷朝傳奇演義諸書所以不廢於世也。」參考丁錫根編，《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頁148。

³⁹ 趙毅衡爲「敘述」所下的定義：「凡是用一種符號手段再現一系列的事件，而這些事件的排列又是具有一定的『可跟蹤性』，這個符號意指過程

序關係，也可以是因果關係。雖然文本敘事的時序關係總是隱含著因果關係，或者說，時序關係其實正是沒有明言的因果關係。從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爲了區分情節和故事的例子來看，「我們對故事下的定義是按時間順序安排的事件的敘述。情節也是事件的敘述，但重點在因果關係(causality)上。『國王死了，然後王后也死了』是故事。『國王死了，王后也傷心而死』則是情節。」⁴⁰以今日的觀點來看，福斯特的說法顯然過於偏頗。如果是對相同素材所作的敘述，「國王死了，王后也傷心而死」，「國王死了，然後王后也死了」，兩段話其實都有因果關係，差別在於前一段是明言，後一段是靠時間關係來傳達，其中的因果關係必須藉由讀者的閱讀過程中被發掘出來。但不可否認地，因果關係比時序關係明確許多，當兩者並存時，讀者通常只看到因果關係，而忽略了時序關係。我們常看到小說家爲了追求文本的開放性，會以時序關係代替因果關係，但歷史學者在處理史料時顯然有不同的考量，或者說讀者在閱讀歷史著作時會有不同的期待，那就是「歷史」的因果關係必須明確清晰。然而史書中過多的訊息量常常會掩蓋了時序關係所暗示的因果關係，導致歷史事件的因果不明，無法達成將「歷史」說清楚的基本要求。

當我們把焦點移至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的差別，可以看出編年體的時間序不一定即爲因果序，但在紀事本末體，這二者卻是合一的，既是時間序，也是因果序。⁴¹編年體體制爲了達成歷史的全紀錄，而犧牲了歷史事件的內在因果連繫，《通鑑紀事本末》

就稱爲敘述。」見於趙毅衡著，《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次印刷），頁1。

⁴⁰ [英] 佛斯特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台北：志文出版社，2000年6月新版三刷），頁114。

⁴¹ 詳參李紀祥著，《時間·歷史·敘事——史學傳統與歷史理論再思》，（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9月初版），頁263。

以情節因果關係為軸線的敘事模式不啻是項適當的修正。《三國演義》雖然穿插野史掌故、奇聞軼事，加以適當的想像發揮，但畢竟是以基本的歷史事實為線索，以歷史人物的行動為主導，建構的過程中雖然並不排斥虛構，但其整體情節中，特別是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卻一定有史實為依據。《通鑑紀事本末》以情節因果關係為軸線的敘事模式，在《三國演義》的成書過程中，正能提供事件敘述的基本單元。

二. 提供事件敘述的基本單元

從紀事本末的體例來看，其整體架構是以事分卷，每卷又各以獨立主題來分章，這種撰寫上的宏觀架構，和年代上稍後出現的章回小說有一定相似之處。在歷史演義小說的發展史中，小說作者從不諱言他們的作品是取法自《資治通鑑》、朱熹的《通鑑綱目》和袁樞《通鑑紀事本末》等，例如熊大木就稱其作《大宋中興通俗演義》是「以王本傳行狀之實跡，按《通鑑綱目》而取義。」小說中明標「按史鑑」的地方有十七處，引錄的《綱目》論斷約有十八處。⁴²因此當我們認真的考察一番，可以發現《通鑑紀事本末》和大多數的歷史演義小說一樣，都是「按鑑」而寫，唯一不同的是袁樞力守史家矩矱，少了小說家「敷演史事，闡明史書義理」的虛構性創作。從另一方面而言，《通鑑紀事本末》作為《資治通鑑》和歷史演義小說的中介，提供了小說家在聚合歷史事件時一個絕佳的範本。李弘祺曾經提出一個極富啟發性的看法，他認為紀事本末體史書的產生是因為宋朝以後，讀書的大眾逐漸增多的緣故，他說：

⁴² 詳參丁錫根編，《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頁78

因為新的讀者要讀具有完整情節故事，而不是花時間去看編年體和紀傳體的歷史。這種要求一個完整情節的故事的希望，與當時的平民大眾要聽小說、彈詞等平民文學的要求可以說是相同的。⁴³

紀事本末體的現身和民間講史的興起，時間上非常接近，兩者之間關係如何，是誰影響了影響誰，或者是兩種是並行發展的文體，學術界中尚未有定論，但可以看到的是兩者的出現有著相近的時代背景。

《三國演義》就整體結構來看，近似於編年體，但仔細分析可知其不完全受「依時序事」成規的約束，反而以巧妙的敘事手法，讓人物、事件的敘述相對集中，藉此突出人物或事件的能見度，人物發展的集中化可乞靈於紀傳體史書，而事件發展的集中化則可取法於紀事本末體。

以下就從兩者之間在情節上的對應關係，來看《通鑑紀事本末》如何影響《三國演義》組織歷史事件：

| 《通鑑紀事本末》 | | 《三國演義》 |
|----------|------------|------------|
| 卷八上 | 宦官之亂（黨錮之禍、 | 第 1 至 9 回 |
| | 董卓之亂） | |
| 卷八下 | 黃巾之亂 | 第 1 回 |
| | 韓馬之叛 | 第 58,59 回 |
| | 袁紹討公孫瓚 | 第 7,21 回 |
| 卷九上 | 曹操篡漢 | 第 1 至 80 回 |

⁴³ 李弘祺著，〈漫論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與意義〉，《食貨月刊》復刊第十卷第九期，1980年，頁18。

| | | |
|------|---------------|---------------|
| 卷九下 | 孫氏據江東 | 第 6 至 86 回 |
| | 劉備據蜀 | 第 1 至 80 回 |
| 卷十上 | 吳蜀通好 | 第 56 至 86 回 |
| | 諸葛亮出師（附平南中） | 第 85 至 105 回 |
| | 吳侵淮南 | 第 96,103 回 |
| | 魏平遼東 | 第 106 回 |
| 卷十下 | 明帝奢靡 | 第 106 回 |
| | 司馬懿誅曹爽 | 第 106,107 回 |
| | 吳易太子 | 第 108 回 |
| | 諸葛恪寇淮南（附孫琳逆節） | 第 108 回 |
| 卷十一上 | 魏滅蜀 | 第 107 至 119 回 |
| | 淮南三叛 | 第 110 回 |
| | 司馬氏篡魏 | 第 119 回 |
| 卷十一下 | 晉滅吳 | 第 120 回 |
| | 羌胡之叛（樹機能、齊萬年） | |
| | 陳敏之叛 | |

三國歷史見於《通鑑紀事本末》卷八至卷十一，每卷各分上下兩部分，總共十九個主題。這十九個主題是出自袁樞本人的構思，代表著袁樞認定三國時期發生的十九件值得紀錄的歷史事件，它們各自獨立，自成首尾，而《三國演義》也都可以找到相呼應的回目。

漢末天下大亂，群雄並起，因此《通鑑紀事本末》在敘述上就必須顧及不同地域的共時發展，如卷八上的「董卓之亂」、卷八下的「黃巾之亂」、「韓馬之叛」、「袁紹討公孫瓚」，《三國演義》

既然是敷演三國故事，就要完整地收納每一個歷史片段，這些動亂和爭戰或為序幕、或為插曲，都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副情節，如「袁紹討公孫瓚」一段，在第七回「袁紹磐河戰公孫」開了頭，便按下不提，到了第二十一回中用滿寵的直接引語，交待整件事的始末；接著卷九上「曹操篡漢」、卷九下「孫氏據江東」、「劉備據蜀」，寫當時三個最重要的政治勢力的崛起，直到三人各自稱帝為止，是《三國演義》中前三分之二的情節主幹，陳美林指《三國演義》屬辮狀結構是極有見地的，⁴⁴全書的焦點流轉於魏、蜀、吳三國之間，寫其各自發展或相互間政治、軍事的鬥爭；當三分天下的情勢已成，蜀國的發展或者說諸葛亮的事蹟成了《三國演義》的情節主軸，《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上「吳蜀通好」寫吳國向蜀國討荊州、關羽失荊州、蜀吳夷陵之戰、諸葛亮遣使至吳，兩國同為盟好，延續了三國分立後的局勢發展；「諸葛亮出師」（附平南中）寫諸葛亮平南蠻、六出祈山，直到諸葛亮病逝五丈原後，魏延與楊儀相爭。兩段敘事相繼成為《三國演義》的敘事主軸，而與其共時發展的歷史事件，如吳國的「吳易太子」、「諸葛恪寇淮南（附孫琳逆節）」；魏國的「魏平遼東」、「明帝奢靡」、「司馬懿誅曹爽」則以插敘的手法穿插其中。最後，卷十一上「魏滅蜀」記姜維九伐中原，鄧艾縋兵西蜀，後主出降，成為《三國演義》的尾聲，而「司馬氏篡魏」，和卷十一下的「晉滅吳」，補足了三國歷史的最終結果——三家歸晉。

以下即是《三國演義》取法於《通鑑紀事本末》情節敘述的基本單位，所形成的敘事主軸：

曹操篡漢

⁴⁴ 陳美林等著，《章回小說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頁91

孫氏據江東 → 吳蜀通好 → 諸葛亮出師 → 魏滅蜀 → 晉滅吳
劉備據蜀

《三國演義》的敘事從魏、蜀、吳的分別崛起，到諸葛亮現身後，逐漸形成以蜀國發展為主情節，魏、吳兩國為副情節的敘述軸線，這些情節都可以在《通鑑紀事本末》找到具體的敘述。因此雖然《三國演義》的創作過程，後人無法知悉，但就羅貫中可能的取材方面，《通鑑紀事本末》聚合事件的發展，將是其能借鏡的重要典範。

第四節、小結

中國的三大史體——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它們在紀錄歷史方面皆因其特有的功能性，而無法互相取代。紀傳體以人物敘事為主軸，長於敘述人物的發展，能縮合人物性格與歷史事件，缺點在於無法呈現歷史發展的整體趨勢；編年體以年繫事，其依時序事的基本結構，足以展現歷史發展大勢，缺點則在寫人敘事方面為符合依時序事的原則，歷史人物和事件被機械式地切割，顯得零碎、不連貫；紀事本末體以情節因果關係為軸線的敘事模式，能將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完整地呈現出來，但缺點在見事不見人，同時事與事之間也缺乏連繫。三者各擅勝場，讓時間上稍後出現的《三國演義》在組織情節上，能得到不同的啓發與助益。

《三國演義》為保持敘事的連貫性和結構的穩定性，它必須採用編年體結構來講述近百年歷史，但整體編年的框架中，又吸收紀事本末體和紀傳體結構的優點，讓人物與事件相對集中，突

顯人物與事件，而能區別於史書，擁有小說的品格。正如楊義所說：

《三國演義》最有神采的地方不是實錄史事，而是對史事史筆進行高度審美化的點化、轉化和剪接。⁴⁵

其敘事結構內在形式的成功，不僅在中國章回小說發展中樹立了典範，在中國敘事學上的意義亦十分重大。代表著編撰者羅貫中成功地整合史傳文學體制，開創了中國章回小說的新紀元。

⁴⁵楊義著，《楊義文存》第六卷《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二版），頁278